

被社會邊緣化的群體—— 香港拾荒長者生存狀態研究

徐斯筠 (TSUI Sze Kwan)¹

摘要

在主流社會的印象中，拾荒代表的是一種只出現於低下階層，沒前途、不穩定甚至是沒有社會地位的「低層次」工作。本研究旨在透過對香港拾荒長者群組的田野考察，以城市邊緣化的角度探索這群在香港參與拾荒工作的長者的生存景況，了解這群被看作為社會底層的人們，在拾荒的過程中所經歷和感受的生活種種，從而分析香港社會的形態與變遷如何影響社會對拾荒者的階級定位。本研究亦會探討以下問題：甚麼因素影響大眾，甚至拾荒者們對拾荒行業的態度與看法？社會加諸在拾荒者身上的邊緣化身份是否符合事實？當中又是甚麼原因造就了拾荒者如此負面的形象——是拾荒者自身的不自愛？是植根於社會的階級觀念問題？是政府所推行的政策的影響？或是現時香港的社會結構和制度的結果？

¹ 徐斯筠系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本科畢業生。她的聯繫方式是：
cecestanley@hotmail.com

導論

在亞洲地區中，香港的經濟發展速度和現代化程度相當高，若以人均生產總值²作計算，香港更是名列前茅的亞洲大都市。因此表面上看來，貧窮兩字並沒有困擾香港的繁華。事實上，貧窮問題確實存在於香港社區當中，而長者的貧窮問題更已成為社會關注的議題。

根據香港統計處(2011)的數據顯示，香港 2011 年上半年度總人口達 7,108,100，當中 65 歲以上人口佔 935,100，即全港人口 13.1%。最新的統計分析發現，本港共約有 1,230,000 人生活在低收入家庭³，貧窮人口約是總人口的 18%。其中長者貧窮問題最為嚴重，現在大約有 270,000 長者生活於低收入家庭，佔了總長者人口的三份一。儘管香港在 1997 年起，將「照顧長者」增設為其中一項重要政策目標，著力提升長者的生活素質，以達到「老有所養、老有所屬、老有所為」的三大目標。(樓瑋群 2007) 可是，根據《信報財經新聞》於 2011 年 7 月 28 日刊登的一篇時事評論指，此長者政策推行 14 年後，生活於貧窮線下的長者人數並沒有減少。現在仍有 19 萬長者領取綜援，而政府至今亦未有實施任何退休保障措施。

然而，除了以上所列舉的種種數據和相關新聞報導外，我們實際對貧窮長者認識多少？當我們一邊期望長者貧窮問題能獲解決的同時，又有否先嘗試深入了解他們的生活？街頭經常可見一些步履蹣跚的長者，推動着卡車、挽着袋子，在路旁拾取紙皮和鋁罐、或是在地鐵站收集免費報章。路人經過他們身旁時或許會泛起一陣的心酸，但除了慨嘆他們生活的辛酸外，大部分人對他們的實質生活狀況、拾荒的原因和所面對的社會壓力卻是所知不多。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民族誌的方式，透過田野考察和深度訪談等重質性的研究方法，輔以文獻和數據的回顧，紀錄香港拾荒長者的生命故事，並從而對他們的生活和社會角色進行深入探討。

拾荒者是封閉性較強的群體，鑑於在社會上的邊緣化地位，他們對群體以外的陌生人的戒心較高，因此研究者很難透過直接的調查方式，例如問卷調查或一次性的訪談，獲取有關拾荒群體的真實資料。所以，理想的研究方法是與拾荒者進行直接的交往，親身觀察和體驗他們的工作和居住環境，建立互信的關係，讓對方感覺自己的聲音能受注重，方可掌握最為真實的調查資料。

²國內生產總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簡稱 GDP)，是測量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的度量。它代表了一個國家於某一特定時間內所生產的產物總值。

³ 低收入家庭定義為：按不同住戶人數劃分，收入少於全港相同人數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根據香港統計處 2011 年第一季的統計數字，1 人家庭的入息中位數為 HK\$6,800；2 人家庭為 HK\$15,000；3 人家庭為 HK\$21,000；4 人家庭為 HK\$25,000

考察地點的選取

本研究的主要考察地點為港島東區的西灣河、箕箕灣。兩地舊式住宅和市檔林立，是不少基層人士聚居的地方，當中未有與家人同住的老人更佔大多數。這些老人沒有投入正規勞動市場的條件，也沒有親人日常的照顧，為了生計就只好投身拾荒行業，這亦是香港舊區常見的現象；第二，要在短時間內，認識不同背景的拾荒長者，與及和他們建立信任關係並非易事。因此在考察前，我選擇聯絡一個跟港島箕箕灣區拾荒長者有緊密聯繫的非牟利團體——關愛動員(*Action Care*)。這團體從事箕箕灣和西灣河區的社區關懷工作多年，非常熟悉這兩區的拾荒網絡，加上團體的義工相當樂意協助我認識該區的拾荒長者，因此我就選定了箕箕灣和西灣河作為我主要研究地點。

可是，拾荒者沒有特定的工作時間，加上他們的工作流動性極高，就算有了義工的幫助，我亦未能與所有曾接觸過的拾荒長者進行深度訪談。因此，我亦設定了深水埗的天光墟作為我研究和考察的地點。我共到過天光墟兩次，希望能夠收集更多不同拾荒長者的聲音，但基於我訪探天光墟的次數不多，加上該區的拾荒長者並不是太樂意跟我交談，所以我在天光墟所得的觀察和訪談資料只可作為我在箕箕灣和西灣河的研究所得的一些補充。

田野考察

在義工的幫助下我共接觸了13名拾荒長者，並且與他們進行非正式的對話，從觀察和聆聽所得，獲取所需研究資料。每次進行訪談前我都設計了一些問題，但所獲得的資料並不會被局限於預設問題當中。對話中觸及的內容如下：

- i) 投身拾荒行業的原因，通常拾荒長者會由此談論到自己一部份的生命歷程；
- ii) 拾荒長者的工作內容，例如時間、收入、路線、作息(吃飯、午睡等)；
- iii) 拾荒者與非拾荒者的接觸，包括與普通市民、公職人員、社工/義工等等；
- iv) 從事拾荒行業的感受；
- v) 在香港社會從事拾荒工作的難處和阻礙。

深度訪談

在13名我接觸過的拾荒長者當中，我曾與其中的5名進行過超過一小時的深度訪談，從中希望以多方面和整體的角度了解這群拾荒長者的心理、價值觀和行為意義。

除了拾荒者的訪談部份，我亦接觸了一些非拾荒者，部份經常與拾荒者聯繫，當中包括義工、拾荒物施予者等等，亦有上班族、學生等不同階層的人士。但我跟他們的訪談並沒有如跟拾荒長者般詳盡，基於研究時間的關係，我只能以隨機方式，跟6位非拾荒者進行過約5-20分鐘的訪談，以了解一下他們對拾荒長者的看法、他們之間的互動等問題。

研究的限制

選擇研究地點時，由於拾荒者的工作在時間和地點上沒有固定性，我能詳細訪問的拾荒者不多，而且基於研究時間所限，我只在港島東區進行考察。

當我實際進行田野考察的時候，發現自己大學生的身份成為一種障礙。在《Hidden Injuries of Class》一書中，作者Richard Sennett 與 Jonathan Cobb指出當一名自視為社會底下階層的人，與一名擁有高學歷的「知識份子」對話時，態度會不自覺地變得謙卑有禮，因為「知識份子」是他們眼中的高尚階級。在與許多拾荒長者交談的過程中，我留意到他們與其他拾荒者對話的語氣，跟與我對話時有明顯差別時，我才意識到我「大學生」的身份讓她感覺到我倆之間的「階級分別」。由於他們知道我正進行研究，他們向我所說的東西或許是為了迎合我所需要的，並非是事實的全部。我唯一能夠做的就是嘗試與拾荒長者們建立「朋友」的關係，讓他們與我進行真誠的對話。由於跟某幾位拾荒長者熟悉了，令我能漸漸分辨到他對我所說的話是真實與否。當我遇上懷疑處時，亦可跟義工核實。

文獻回顧

「下層階級」的概念

拾荒這行業一直存在於我們的生活當中，由於拾荒者工作的無定性和缺乏生產力，他們長期被視為社會的不安定份子，在大多情況下，大眾不甚會給予他們注意與關懷。而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以另一種角度，重新了解拾荒者這個群體，與及思考他們在社會上的功能和角色。

台灣樹德科技大學研究生劉大加，曾於2007年進行了一項有關台灣高雄市拾荒者的研究，當中他提出了「下層階級」(Under class) 的概念，描述拾荒者在現今資本社會的狀況：

「(底層階級是.....)由失業者、無就業能力者、低度就業者所組成的弱勢階級,他們越來越無望地脫離這個國家的主流生活。他們是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受害者。」(方孝鼎 2005; 引自 Myrdal 1962:10)

Myrdal最初將「下層階級」的概念引用到美國社會上，它對應的是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面對高度工業化發展，但生活條件卻持續下降和惡化，例如有很多地方出現了乞丐、流浪漢、黑幫、弱勢族裔等高失業率與低薪就業的群體，他們當中甚至會有酗酒嗜藥或主張街頭暴力的份子。此類社會景況往常見於都市化發展已趨成熟的社會，顯示了社會已分裂成「繁榮興盛的區域與及長期處於貧窮、邊緣化的貧民窟。」(方孝鼎 2005; 引自 Mingione 1993)。

若然就「生產工具」(means of production)而言，下層階級無疑是屬於「無產」的一群，他們沒有足夠的資本（不論是物質、學歷、技能等方面）生產或是投入

「正規」的勞動市場(formal economy)。不過，有人或會反駁，下層階級可被視作為資本市場上「高勞動低技術」工作的「後備軍」(方孝鼎 2005)。但是以香港為例，勞力資本和工人從國內大量輸入、講求密集性服務與技術的工業大幅擴張的情況下，香港的下層階級根本沒有充足的資本(包括教育水平、職業技能)成為資本市場上的「後備軍」，他們對香港後工業市場的發展似乎起不了任何幫助。因此，下層階級的人口往往會選擇以街頭乞討、流浪找食物、甚至打劫販毒等方式維持生計，「自願地」脫離「正規」的勞動力。從事拾荒工作正是香港下層階級常見的一種生存方式，這行業所消化的是社會多餘的產物—垃圾，對於大眾而言可說是不穩定，甚至是不正當。在香港這個城市化的空間生存，拾荒者需要面對的不只是同業競爭，而更要在社會制度、階級間的貧富觀念中求存。

過往有關拾荒者的研究回顧

本地研究

雖然我們不難在香港的街頭找到拾荒長者的蹤影，但是本地有關拾荒長者的研究可說是相當少，由於拾荒者是獨立的工作單位，工作全是自發性而且沒有統一的活動方式，社會實在難以對他們進行實際的數據統計。當中所能找到的只是一些有限度的描述或數字統計，例如對拾荒生活的描寫(王明青 2003)、散文作品等(曾繁光 2007)。上述作品中，有些從了解拾荒長者群組出發，另外的則是以散文方式描寫一個個拾荒長者的故事。

近年本地較為詳細和具質性的拾荒長者研究，為樓瑋群教授在 2007 年為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所寫的《香港拾荒長者研究報告》。樓教授進行了多項田野考察，訪問了超過 90 位的拾荒長者，並引用了西方「社會融洽」(social inclusion)與「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理論作討論，在經濟需要、社會需要和福利排斥三方面分析拾荒長者與香港社會的關係、他們的角色和社會地位轉變。樓博士的研究結果顯示，大部份拾荒長者加入拾荒行列作主要的收入來源；有些雖然主要依靠儲蓄或政府綜援資助過活，但他們仍同時選擇以拾荒來補貼家庭和個人收入。

外地研究

事實上，有關華人社會的拾荒者研究亦非常少見，其中在中國，社會學學者張寒梅(2001)曾以城市邊緣化的角度了解在中國貴陽市的拾荒者生活狀況。此研究最具啟發性的地方是張寒梅指出了社會結構的變遷是驅使拾荒工作被邊緣化的原因。拾荒是一種靠著回收或轉售社會消費所產生的多餘產物而成的行業，拾荒並非製造業也非服務業，它只算是一種消化業，它所消化的是社會多餘的東西，但這項功能在講求生產力的資本社會並不重要，所以從事拾荒的人在社會裡只是底層階級，是被社會所邊緣化的一群人。除了在中國的研究，在台灣也有學者就拾荒者如何在制度化與空間化的社會中求生作研究，並將國家定義為主要控制社會階級分配的機器，透過劃分都市空間將拾荒群體排擠於社會核心階層之

外。(劉大加 2007)

至於有關非華人拾荒群體的研究，討論可分為兩個層面。(劉大加 2007) 第一個層面可從社會角度出發：在社會中誰會選擇拾荒的工作？印度社會學學者 Rama Sharma(1995)在其著作《Bhangi - Scavenger in Indian society, Marginality, Identity and Politicization of the Community》曾指出印度正處於經濟轉型時期，大量本來在農鄉生活的人一下子湧到城市。這些未能在城市找到工作的人，與及在印度階級制度下沒有重要地位的婦女和兒童，往往會在具有權力的家庭社員（大部份是男性）的威逼下成為拾荒者。不過，由於印度的拾荒者眾，他們所造成的社會問題達到不可被忽視的程度，所以這些拾荒者在不同社會組織的幫助下，漸漸團結起來，旨在共同爭取在廢物管理工作上應得的權益和保障，例如回收品價格的制定、拾荒工作時的勞動保障等等。(Sharma 1995)

第二個方向是從個人層面作探索，無疑大多從事拾荒工作的人是由於社會結構的轉變、家庭等因素才選擇這種應付貧窮的工作。拾荒工作對個人和家庭的影響可以是長遠和負面的，例如拾荒會讓自我形象低落、遭受歧視與冷眼、影響個人身理和心理健康，世界衛生組織曾就「個人健康」(well-being)下定義，指出拾荒者正是身理與心理健康最脆弱的群體之一。(潘正德 2009)

拾荒長者的工作與生活經驗

在香港，由於「拾荒者」給予人的印象總是骯髒、沒有工作能力、貧苦和失去活力，所以拾荒基本上從不是年青一輩會選擇的工作。對於這個被邊緣化的行業，社會大眾所給予的關注可說是相當少。為了喚醒大眾對基層貧窮問題的關注，香港電台電視部在 2011 年特意製作了一年六集名為《窮富翁大作戰》的電視節目，節目邀請到六位生活無憂的富翁，讓他們親身體驗五天的貧窮人士生活。在節目最後兩集，投資公司主席陳光明親身體驗了拾荒的生活，他在整個體驗過程中，最常說的一句是：「完全想像不到。」(香港電台 2011) 他所想像不了的是，拾荒長者的生活狀況比他原來想像的更為貧困，他曾說：「原來在東方之珠的繁華背後，有著一群活在如斯惡劣境況，如同被社會遺忘的長者，這才真正體會到痛心的感覺。」(陳光明 2011) 究竟香港的拾荒長者是過着怎麼樣的生活？

經濟收入

在我所接觸過的 13 位拾荒長者當中，有 9 位是依靠政府的經濟緩助（高齡津貼或綜緩）、正職工作收入或子女經濟上的資緩維生，拾荒是為了多賺一些金錢幫補家計，而其餘的 4 位則是完全依賴拾荒工作維生。事實上，要完全依靠拾荒來維持生活相當困難。根據樓瑋群(2007)的調查所得，拾荒長者一個月的收入平均為\$500，收入最高的也只有\$2000，若然將這些數字對比現今香港的生活水平，這樣的收入根本難以讓人得溫飽。

福伯是我訪問過的拾荒長者當中，完全依靠拾荒維生的一位，他年屆 85 歲，

但他工作的時間比一般上班一族長。每天早上六、七點工作到傍晚的七點，福伯會推着木頭車，拖着一個膠製的大盒子（當他拾得一定數量的紙皮時，會將清水倒進膠盒子中，並弄濕紙皮令它們變重，從而賺得更多錢），流連於筲箕灣一帶執拾紙皮。

「這些（指着木頭車上的紙皮，大約一個人的三份一身高）大約能賣得二十元……現在紙皮賣得到的錢越來越少，濕了水也賺不多。」

就算福伯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他每月最多也只能賺得\$1000左右，除了兒子替他租借了一處二百尺左右的單位，供他和妻子居住外，生活上所有雜費均需要自己支付。儘管福伯的太太亦會拾荒增加收入，但是他每天仍過得相當節儉，有時候他甚至將一日三餐濃縮為一日一餐。當問及他為甚麼不申請政府資助，他說他自己仍有能力工作，不用政府幫忙，對自力更生的生活仍抱有堅持和傲氣。

香港最常見的拾荒物是紙皮、報紙和鋁罐(樓瑋群 2007)，膠樽並非主要的拾荒物，因為它的回收價格相當低。至於其他回收物，例如舊衣物、電器和鐵等，亦甚少被拾荒長者拾取，那是由於這些回收物的體積和重量未必是拾荒長者所能處理，加上它們的回收價很高，一般家庭和商戶都不會隨意將它們丟棄於街頭，而是直接將它們拿去回收，賺取回收費。

關於拾荒物的回收價問題，我曾多次到回收店舖觀察。香港有許多回收店是私營的，因此它們回收的價格均有不同，大致價格差異浮動於一斤四毫至兩元，這差異或許在我們眼中微不足道，但在拾荒長者眼中卻是很大的分別。拾荒長者在拾取足夠紙皮後，用木頭車將它們運到常到的回收店去，但我不只一次看到拾荒長者跟回收店爭議為何回收價被改動了的情景。在我訪問過的拾荒者中，有不少喜歡將他們拾取回來的紙皮，一塊一塊地浸入水中，又或是灑水於紙皮上，這樣做是希望讓紙皮重一點，當到回收店秤重量時，能多賺幾塊錢，可看作是長者為了賺多一點錢的生活小智慧。

另一位拾荒長者敏姐曾這樣告訴我：「我當初都不懂這樣做（弄濕紙皮），但當我到回收店，看到一個阿婆的紙皮全是濕的，然後問問她原因，之後自己也這樣做了。」可是當越來越多長者這樣做的時候，回收商當然會作出反應。有一位筲箕灣區回收店老闆告訴我：

「你不可能跟長者說因為紙皮濕了，所以我不收了……若然那位婆婆跟你說



圖 1) 其中一間回收店的回收價錢

那些紙皮原是濕的，那你要怎麼辦。況且跟長者們吵架始終不太好，那倒不如自己稍為調節一下回收的價錢。」然而，這位回收店老闆沒有告訴我的是，回收價格被下調會為拾荒長者帶來甚麼影響。現時紙皮的回收價大概是一公斤一元，長者拾得了十公斤的紙皮，可換得十元，將紙皮加水後，假設紙皮可增加至十一公斤，讓長者多賺一元。可是，當回收店將這價格下調一成，即變成每公斤九毫後，就算長者將紙皮加水，也只能收得九元九毫，這小小的差異長久下去必然會對長者的收入造成影響。又若然拾荒長者是老實的，沒有將紙皮弄濕，只是拿十公斤的乾紙皮賣，那麼他的收入會由從前的十元變成現在的九元。最後，那些沒有弄濕紙皮的拾荒長者，也只好無奈地跟著這個做法。當紙皮越浸越重，長者便會推得更辛苦，但回收店的回收價格卻變得越來越低，最終受影響的都是所有拾荒長者。



圖 2) 露宿於公園內的敏姐

拾荒以外

由於拾荒所能賺取的收入不多，因此許多拾荒長者只視它為一項幫補家計的副業，例如在我訪問過的拾荒長者當中，有 4 位擁有正職（兩位為清道夫，兩位在酒樓工作）。還有一些拾荒長者選擇不將拾取回來的物件回收，反將它們再次賣出，以賺取更多的金錢。「天光墟」正為這些拾荒長者運作。

「天光墟」是出現於香港基層地區例如深水埗、觀塘、天水圍等地的清晨攤檔，來擺檔的主要是生活較為窮困的長者，他們會將平日拾取回來或人們所捐贈的東西拿來販賣，當中包括破損了或是經過二/三手使用的電子產品、衣服、玩具、影碟等，因為在「天光墟」售賣的物品全不是新品，所以價格相當便宜。不過在「天光墟」擺檔亦非易事，在天光墟兩次的觀察裡，我發現逛「天光墟」的人並不多，而且來買東西的人絕大多數亦是較為清貧的人士。雖然這一點我不能單從他們的衣著作判斷，但是我觀察到許多在「天光墟」購買便宜物的人，也會選擇跟檔主議價，這一點也許可以證明他們消費力並不高。再者，社會空間被階級意識所分化，天光墟只有出現在陰暗角落，為的是避免小販管理隊的監控，但社會大眾並不會走到這些角落，只有同樣是社會低層人士才會有更大機會接觸到「天光墟」裡的拾荒者，因為大家的活動範圍類同。所以拾荒長者在「天光墟」

亦不能賺很多錢，跟我傾談過的 4 名攤販均說，他們一天的收入甚少超過 50 元，每天若能賺得 30 元已相當不錯。



圖 3) 天光墟的景象

同業競爭與關係網絡的建立

拾荒長者沒有一個正式的聯會為他們爭取權利，在欠缺組織的保障下，拾荒長者的個人行動不會被回收商會重視，他們的聲音更沒法被商會納入商議過程中，所以他們的需求往往難以被當權者聽見。（樓瑋群 2007）例如當他們遇到偷竊、爭執、受傷等問題時，只能透過自己的方法解決。75 歲的周伯伯說：

「現在經濟不好，從鄉下走來的新移民又多，出來做這一行的人越來越多，越來越多人跟我爭紙皮。有些不懂規矩的，甚至會跟我吵起來，說這張那張紙皮是他的……都沒辦法，年紀大了都不能跟對方吵，只好算了。」

無可否定的是，不論是拾荒長者的社會地位或是體力，都不足以成為他們與其他抗爭的條件，所以面對爭執和問題時，許多時候他們只能吞聲忍氣。不過慶幸的是，拾荒長者也能建立自己的人際網路，例如是鄰舍為他們提供回收物、一些物質上（如食物、衣服等）的幫助、又或是心靈上的支持。敏姐曾跟我分享過這樣的經驗：

「從前我在搬紙皮的時候，曾經一個男人去過來推開我，說我阻礙他走路，當時另外有兩個男人走來扶著我，跟推開我的那個男人爭論，所以說社會有很多好人，但亦有壞人。」

而我在田野考察的過程中，多次看到街坊協助拾荒長者的畫面，就好像林婆婆，她會定期於一間藥房門外收集紙皮，她的手推車亦停泊於店門外。藥房的老闆經常給予林婆婆廢紙垃圾，這位老闆說：

「這條街道又不是我的，這些婆婆延可憐，我們可以幫的就幫吧，反正這些垃圾我們都沒有用。」

同樣，一位任教於筲箕灣某小學的葉老師亦說：

「在校園門外，經常有一位拾荒婆婆長駐於鐵欄杆旁。校方起時都沒有留意這位婆婆，但之後越來越多學生在午飯或放學後，都會將鋁罐廢紙交予婆婆，校內的小吃部有時候亦會將沒用的紙皮交給她。這做法相當不錯，可以使學生更留意社會的低下階層，不過校方除此以外，並不會對這位婆婆提供任何額外的經濟援助。」

可是，並不是所有拾荒長者都能感受到社區的關懷。不同於我在港島區接觸的拾荒者，部份在天光墟擺賣的拾荒長者明顯對陌生人的搭訕有所抗拒。相信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們正進行生意交易，所以不希望非顧客在旁打擾。但是除此以外，當我嘗試在兩個不同的攤檔拍照作記錄時，攤檔的檔主馬上嚴厲喝止了我的舉動，其中一位看似已有 80 歲的老翁對我說：「我們這些窮等人家沒有甚麼可給你拍照！」而另一位中年婦女則警告我：「你不可拍到我『寒酸』的樣子！」從這兩個警告已可感受到拾荒者在某程度上，對自己的身份抱有自卑感。深水埗的拾荒者相對筲箕灣這群拾荒者冷淡，或許是該區的社會關懷配套不足，他們甚少有義工或社工們關懷，社交圈子狹窄驅使他們對外界社會排斥。

家庭與社會關係

與不同拾荒長者的訪談過程中，我發現家庭總是讓他們有口難言。大多拾荒長者都沒有穩固的家庭關係，在我訪問過的 13 位拾荒長者中，有 2 位是單身，就算其餘 11 位都擁有自己的家庭，他們的負擔亦不見減輕。幸運如周伯伯，能夠跟兒子同住，兒子亦幫忙拾荒賺錢。他指出：

「拾荒其實只是幫補幫補一下生活。我現在體力不好，以前可以拾到差不多二千元一個月，現在拾得不足一千元。從前兒子還有一份正職，生活就不成問題。現在他都拾荒了，兩父子每月拾得三千元左右，加上綜援一個月大約一萬元收入，節儉一點都還能過活。還好當年（二十多年前）用兩萬元買下這座房子，現在不用租地方住。」

可是，許多拾荒長者都是因為子女沒有能力照顧自己，才會選擇拾荒這行業。長者的子女基於不同的原因沒法供養父母，而父母亦不太願意給予他們過大的壓力，所以只好自力更新。好像敏姐，她的性格相當樂觀和健談，但每當我問及她的家人時，她總是有口難言。當我問及她的家人有否嫌棄她去拾荒時，她指：

「我的家人早已離開我…若然我的兒子還在，我就不用從事拾荒的工作，但沒關係，只要自己不嫌棄自己就可以了，若然不去拾荒自己也維持不到（生活）。」

除了家人以外，同樣叫拾荒長者難受的，是社會給予的嫌棄目光：

「當然有，人家見你堆着一整車的垃圾，在街頭又走得慢，人們經過我們身邊有時候都會向我們展露嫌棄的眼神，甚至我亦曾被責罵我們骯髒和阻路。開頭拾荒時感覺並不好受，因為從前在酒樓上班都會打扮得好一些，會化妝，但現在打扮了人家也是叫你『垃圾婆』，有時候自己都會有少許難過，不過年紀大了，無所謂吧。……好人比壞人多很多，生活可以維持到就無所謂了。」

有時候當我探訪敏姐時，會跟隨她到街頭走走，體驗她日常拾取紙皮的工作。在過程中，我深深明白到為何她會說拾紙皮的過程相當孤單。除了經過店舖門外，問問人們有沒有不要的紙皮外，敏姐基本上沒有跟任何人有交談的機會。當她在街頭整理手堆車上的紙皮時，路人大多只會看一看她便走過，她似乎沒有



跟任何一個路人有交集的機會。有時候一些義工會來探望敏姐，但他們是處於「施者」和「受者」的關係，兩者的身份並非完全對等。事實上，社會一方面常以「憐憫」、「需要救濟」的眼光對待拾荒者，加深了拾荒者「底下階層」的身份；但同時，若我們不接濟拾荒者，他們又會如何？階層觀念似乎無可避免地存在於社會上，但不同階級之間的互動該如何，就成了一個相當值得探討的議題。

圖 4) 其中一名拾荒長者的居所門外

「社會排斥」理論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在2007年進行了一份有關本地拾荒者的質性研究，並在研究中引用了一個常用於討論貧窮問題的社會學理論——「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從上述可見，拾荒長者讓人感慨的生活景況，似乎是離不開「貧窮」兩字。貧窮源於不公平，但貧窮不只是物資分配不均造成，也是社會對邊緣社群的排斥所致。(Wong 2001)

福利排斥

從我在田野考察中的訪談可知，由於年紀與工作能力的關係，絕大部份的拾荒老人對於尋得一份正規工作，已沒抱有希望，在我曾接觸的 13 名拾荒老人當中，只有 4 名擁有拾荒以外的正職。基於拾荒所能帶來的收入並不高，他們當中有 6 名領取政府的高齡津貼，即是俗稱的「生果金」，3 名領取綜援，而其餘 4 名則是接受家人供給、以積蓄或正職工作維生。

拾荒長者的經濟活動能力低，他們往往由於年紀的問題已漸漸被排斥在勞動市場以外。所以有許多長者都是在沒辦法從事正規工作的情況下，才開始拾荒的工作。雖然香港政府有一套香港長者福利計劃，為長者提供經濟上的補助，但我發現在受訪的拾荒老人中，只有 3 名領取政府的綜援，這數字比我預期的為少。

問到其中一位沒有申請綜援的拾荒長者林婆婆有關申請綜援的事宜時，她這樣回應：

「我知道拿綜援好，可以幫補一下生活嘛！但申請綜援很麻煩，要查這個查那個，我都不懂！我自己無兒無女，姨甥女又工作繁忙，都不好意思叫她幫忙，還有我平常使費不多，拿到政府的生果金 (即高齡津貼) 就夠過活了。」

香港政府現時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簡稱綜援)，是有經濟困難的市民的一項入息補助，就一名身體健全的 60 歲以上單身長者而言，他所能申請到的援助金額為每月\$2820，至於 60 歲以下的則為每月\$1990(由 2012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的限額)，若是與高齡或殘障的家人居住的，則能獲得每月額外數百元的補助金，補助金額視乎家庭成員數目和家人健全程度而定。但是綜援的申請表需要填寫的項目非常多⁴，長者難以清楚明白申請社會福利的條件和內容，他們會擔心申請手續麻煩而不願意申請，使他們不能獲得社會提供的福利，造成福利排斥。

另外，長者申請綜援的另一大障礙，是一張名為「衰仔紙」的聲名文件。「衰仔紙」，正名為「不供養父母證明書」，是長者申請綜援時，子女證明自己已沒有能力或不願意照顧父母的經濟聲明。按香港現時的綜援制度，60歲或以上與子女同住的長者，在申領綜援的時候，是必須以家庭為申請單位，而審查員需按整個

⁴ 請參見：[http://www.swd.gov.hk/doc/social-sec/cssa_app1010\(rev\).pdf](http://www.swd.gov.hk/doc/social-sec/cssa_app1010(rev).pdf)

家庭的入息和所擁有資產的多少，並需要子女聲明會否供養那位長者，以決定綜援的數目。(林瑞琪，葉寶琳 2010) 申請綜援的長者並不能在任何社會福利署的辦事處取得「衰仔紙」，長者的兒女是需要直接到社會福利署，跟辦事處的職員面談時，並在面談中作出「不供養父母」的聲明。

現正領取綜援的關伯伯指出他與家人簽署過「衰仔紙」，他說：

「我和兒子早就知道申請(綜援)要簽『衰仔紙』，我也知道兒子這樣很沒臉子…但我們都是想有多個錢幫補下，簽了(衰仔紙) 又不是代表他要趕我離開，都是簽個名，他現在還不時跟我上酒樓，跟從前沒分別！」

可是，並不是所有長者和子女都能如同關伯伯一樣，對「衰仔紙」看得這樣淡然。曾有社工告訴我，她知道不少有需要的長者由於不願自己的子女為他們背上「衰仔」的惡名，因為「遺棄父母」在華人社會的眼中，是極不道德的行為，所以儘管「衰仔紙」只是一張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文件，亦不論自己的經濟狀況有多困難，有許多拾荒長者都不願意要求子女簽紙放棄供養他們，他們寧可繼續拾荒維生；然而有時候，有些長者願意申領綜援，但他們的子女卻不願意簽紙，結果令兩代之間的關係漸漸破裂。

但是能夠領取綜援不代表生活質素會大大改善。事實上，我所接觸有領取綜援的拾荒者，他們所能領取的金額並不多，絕不超過\$3,000。以現時香港的消費物價而言，就算是多麼節儉的單身人士，二千多元也是相當緊拙的生活資金。

在社會福利層面上，許多拾荒長者因着不同的原因而被排斥在社會福利體制外。第一種排斥的情況是主動的，一些長者不願意申請任何經濟上的援助，這或許是體現了中國文化將社會福利看作成憐憫與施捨，是一種社會的負面標籤，還有部份長者不願意兒女「沒面子」，背負不守孝道的惡名，而放棄申請經濟補助。第二種排斥的情況是被動的，部分長者因為種種原因而未能符合申請經濟援助的資格，例如申請綜援時所需的資產審查，還可能是長者仍與子女同住而不能申請等。(樓瑋群 2007)另外，加上申請社會福利的程序相當繁複，由於部份長者的教育程度不高，未能應付申請經濟補助所需的程序，最後導致被排斥於香港的社會福利系統之外。

經濟需要

在經濟層面述說，拾荒長者絕對是被社會排斥的群體之一。造就拾荒長者被社會排斥的第一個主因是對高齡的排斥，社會認為長者持續投身勞動市場，只會奪去年青人的工作機會，最後逼使長者選擇不正規而且低收入的工作(informal economy)。第二個主因是技術的缺乏，香港的工業早在八十年代，北上到內地甚或是東南亞等地，勞動市場由需要大量低技術勞工，轉變至對金融、高科技人材的需求，可是現時的長者人口所欠缺的正是這些高科技才能，所以他們根本難以

就業。再者，香港一直以來沒有全面的老人退休保障，導致許多失業的長者陷入貧窮的困境。生活上的貧窮最能見於拾荒長者消費力的貧乏，收入不足導致他們不能隨意消費，他們的消費僅為每天的溫飽，與及應付日常必須的開支，他們根本不能參與任何消閒性的活動。因此，在香港這個以消費見稱的城市，拾荒長者可說是完全被排斥於主流社會外。

社會關係

社會學學者張寒梅(2001)曾在其研究中國貴州拾荒者的著作《城市拾荒人——對一個邊緣群落生存現狀的思考》中，指出拾荒者會被社會邊緣化，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基於他們明顯的身體特徵，拾荒者的工作環境無疑是十分惡劣，畢竟他們每天的工作就是處理數之不盡的垃圾，而垃圾那讓人生厭的氣味和拾荒者主觀存在的骯髒感，實在會使人避而遠之。拾荒工作的惡劣環境甚至會引致糟糕的結果，那就是生病和死亡。同時，他們不僅要忍受這行業的辛酸，還要感受因為拾荒而帶來的歧視與自卑感，因此無論是拾荒者惡劣的工作和生活環境，或是從社會歧視目光而來的自卑感，都是導致拾荒工作邊緣化的主因。

另外，社會結構的變遷亦成了驅使拾荒工作邊緣化的原因。劉大加(2007)在其研究台灣拾荒者的論文中，指出隨着社會的人工分層越來越仔細，社會對於每個階層與行業的要求亦越高，每人在工作上所需擔當的功能會變得集中和單一化，但是正因為社會不再要求工人多元化的工作，工人就需要在單一化的工作上表現出一定的社會價值，個人的生產技術是直接影響個人「階級定位」的主要因素，達不到要求的工人就會被社會淘汰，而拾荒者正是沒法達到社會生產要求的一群。再加上他們的支援網絡仍是相當薄弱，導致他們成為常被社會歧視的群體。可以想像，他們的心靈健康在許多時候並不理想。

拾荒長者與香港社會的關係

以上主要記述拾荒長者的各種生活經驗，還有他們所要克服的困難及歧視眼光。由個人層面擴展到社會結構層面，香港社會結構如何影響拾荒長者的階級地位？環保政策的制定有否方便到拾荒長者，還是更將他們排斥在外？拾荒長者又是怎樣透過回收垃圾的工作，穩定自身的低層地位？現行的社會制度、法規、城市空間的劃分、經濟活動、同行的競爭等等，種種的因素每時每刻都影響着拾荒者的生活，以下將一一剖析拾荒者是如何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生存。

「制度」的制定與「時間」的劃分

在探討拾荒業如何被現時的社會制度排斥前，我們先必須了解「社會制度」的定義，與及香港整個社會發展狀況。

早期人類的聚居模式發展，大致由最早期的採獵散居生活(hunter and gather)，發展到以耕種為主的生活模式，直到隨後工業的迅速發展，帶來了影響人類生活相當深遠的工業社會型態。(McBride et.al. 2008) 在工業型社會裡，勞動

力是社會重要的資產，工廠、公寓、宿舍、飯堂等等，所有跟工人生活息息相關的建築有規律地出現於每個社會空間之中，而工人的生活也隨着工廠的運作時態被有規律地劃分，其中著名的例子有美國1884年所提倡的「三八制」，工廠工人的生活時間被平均劃分為「工作 8 小時、休閒 8 小時、睡覺 8 小時」，可見工業的興起有規律地改變了整個社會的生活模式。至於未被規劃的社會空間，混雜的建築與複雜背景人口交雜於一起，造就了不少社會問題：偷竊、吸毒、貧窮、疾病等，問題的衍生破壞着社會的秩序，因此社會需要制定一套規條，來約束和解決此等社會問題，這就是「制度」的產生原因。(劉大加 2007) 美國經濟學家 Douglass North(1981)曾定義「制度」就像社會的遊戲規則，影響人們的互動關係，它為人們定立了一系列的法則，以約束個人或團體的生活，好讓他們全在統治者的管轄範圍內。那麼，工業化的發展是如何影響着香港社會？香港社會的「制度」又是從何而生？

經過二次大戰和八十年代兩度的經濟轉型期，香港早已脫離工業社會，成為了以資本主義為主導的國際金融中心，但就如著名人類學家 Emile Durkheim 曾說，我們都市人一直都是生活在工業化的秩序之中，工業社會的生活模式一直延續到現代社會，現時香港的社會秩序跟工業化時期一樣，是由「時間」所劃分和制定而成的。在工業社會中，「時間」是標準化的象徵，幾乎全世界都依循同一個計時系統。利用時間控制空間是工業社會的必然規則，當機器代替了人力生產，機器成為資本家最重要的資產，機器的管理變成工廠運作中最重要的一環，因此資本家利用「時間」的標準，訂立不同的生產規條，以控制員工的工作效率和機器的生產進度，而工業社會的工廠「秩序」就因此而生。(陳迪暉 2004)

而現今香港現代化社會所呈現的，是跟工業發展時期一樣的社會「秩序」，是一種有秩序的、被時間約束、被管制的生活狀況，這種生活模式演變自工業社會，但現代化社會的「秩序」不再是廠方用作掌控工廠裡的生產，而是被國家政府所使用，以控制社會各階層的生活。具體而言，在現今社會中，人們的生活作息仍是依照機械時鐘的運行為依歸，當中有着明顯的秩序性，例如大部份的工作有固定的上班下班時間、交通工具運行在特訂的時間表中、學生有一定的升學程序、政府將城市空間劃分為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等制定區內市民的活動和行為。在種種的社會秩序規範下，人們會漸漸學會自我約束，知道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該做甚麼事情，更會有一套有規律性的工作時間表。(Giddens 1991) 但拾荒業不論是工作時間、地點、拾荒物的種類和得來的收入，都是一種自由而不受規範的行業，只要有回收物堆積的地方，都可看到拾荒者的蹤影。拾荒業，跟同其他沒有規律性的工作如行乞、無牌小販等一樣，都被視為擾亂社會秩序的一群。

不只是拾荒者沒有規律性的工作模式被社會排斥，香港現時有秩序性地處理垃圾的方式，雖然是減少了細菌和疾病的傳播，與及增強了社會的衛生狀況，但是卻將拾荒者的工作更變邊緣化。拾荒年資有達十年的福伯告訴我，從前他剛開始拾荒時，一切都比較容易。第一，當時沒有太多新移民從事拾荒這行業，同業競爭比較少；第二，當年香港仍未有太多關於廢物處理的規例，從前街頭的店鋪

或行人可以隨意將紙皮或垃圾放在路旁，清道夫或大型垃圾車會於清晨時份清運垃圾，這種掉棄垃圾的形式容許拾荒者隨時檢取路旁的垃圾。可是垃圾的隨處掉棄同時會引起了疾病的傳播，並影響市容。有見及此，政府隨後實施了亂拋垃圾定額罰款的規例，任何商鋪和行人隨意掉棄垃圾，都會被罰\$1,500。同樣，為了更方便廢物的處理程序，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於2005年「在全港推行『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目的是為樓宇的每層和屋苑範圍增設廢物分類設施，方便居民將廢物分類」，全港亦放置超過42,000個垃圾分類回收桶，以增加本港處理垃圾的效率。(香港立法會 2010) 究竟這些環保法則如何影響到拾荒者的工作呢？

新環保政策與拾荒行業

香港廢物處理規例的設定，是為了更有秩序和有條理地改善本地的衛生情況，香港垃圾的回收量亦正每年遞增(香港立法會 2010)，但這又能否讓拾荒者拾取得更多回收物？

紙皮都不見了

從我田野考察所得的結果可知，以上問題的答案絕對是否定。環保政策的制定只會將拾荒者的工作更推向邊緣化，從前他們只需要根據垃圾車的清運時間工作，但現在許多本該被放置在路旁的垃圾，都被快速清理或是回收掉，正如敏姐所說：

「我們又不可跟人鬥快，現在大家都將垃圾回收，你又不可以打開那回收箱（偷垃圾），被人發現會很麻煩，所以紙皮變得相當難撿……自己年紀大了不會四處走動，現在我大多數會跟相熟的店鋪討紙皮。」

因此，香港有許多拾荒長者都有所謂固定的「根據地」，這些「根據地」往往是鄰近他們相熟的店鋪，好讓他們拿取店鋪所給予的回收物。本地的環保政策逼使拾荒者想出另一條拾取垃圾的方法，從前他們是四處走動的，現在只好駐守在某一地點，像是與人乞討般，等待別人施予他們垃圾，拾荒工作由動態變作靜態，他們的收獲不再是全憑自己的辛勤得來，而是同時要依賴別人的施捨，這樣的做法令原本已是低微的工作更變卑賤。

垃圾愈來愈難拾取是我聽得最多的拾荒者心聲，除了因為同業越見劇烈的競爭，環保政策的制定也是主因之一。當然怪罪政府的環保政策似乎不太合理，畢竟環保政策都是為了改善社會的衛生狀況，但拾荒者的生活受到影響亦是無可否定的事實。事實上，社會每項政策的設定，都隱藏着社會統治者對每個階級的規範和約束，這些環保政策的設定，無奈受到最大約束的並不是隨處掉棄垃圾的市民，而是依靠垃圾維生的拾荒群。

公共空間的佔用

上述曾提及許多拾荒者也擁有自己的「根據地」，這些「根據地」偏佈大大小小的公共地方（例如街道旁、公園、垃圾站旁等等），他們會將手堆車停泊在這些地方，有時候亦會將收集回來的垃圾堆積在此。對於公共空間的使用者而言，拾荒者的出現或許會讓他們產生負面感覺，感覺地方變凌亂和骯髒，大大降低了城市景象的美觀感，令大眾市民對拾荒者產生反感。我訪問過的拾荒長者曾多次先訴我，遭受路人白眼甚至責罵是慣常發生的事，我亦親身見證過一名中年男士指罵一名拾荒婆婆阻街和身體發出難聞氣味。

拾荒者佔用公共空間，絕非是一個地方政府期望看到的社會景象，除了直接派出政府人員干涉外，環保政策的制定亦間接起了幫助。要知道香港的環保法則是要解決垃圾處理和社會衛生問題，但是政策運行的背後隱藏着統治者對統治空間的想像與規劃，政策不只針對全民處理垃圾的習慣，更間接控制一群依靠撿取垃圾維生的拾荒者的生活行為，以維持整個城市的景觀。（劉大加 2007）

事實上，拾荒者的「根據地」是拾荒者整理拾荒物的地方，也是他們的休息站，但往往他們佔據的都是城市裡被邊緣化的角落，因為香港寸金尺土，許多空間都被中層或以上的階級霸佔了，社會上的弱勢社群如拾荒長者一直缺少屬於他們的城市空間。不過，雖然拾荒者工作的地方都被大眾視為骯髒不潔，但這些地方卻是讓拾荒者尋獲同行認同感、不受歧視的空間。



圖5) 位於街道後巷的拾荒角落

非正式經濟 (Informal Economy)

非正式經濟是社會經濟體系的一部份，是正式經濟(Formal Economy)所剩餘的歸納方式，當中涵蓋的種類有許多，從事非正式經濟的人可被廣義分類為家庭主婦、自雇人士、小販、毒品交易等等。非正式經濟基本上存在於所有社會中，但卻難以被監控，因此非正式的經濟活動通常不在納稅和正式經濟統計範圍內，要直到其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時，政府才會企圖監控。（阮冠穎 2003）

英國人類學家Keith Hart(1973)在其研究非洲加納非正式經濟體系的文章《Informal income opportunities and urban employment in Ghana》中指出，正式與非正式經濟最大的分野是在於工作者所得的機會，與及他們所付出的勞動力能否獲得持久和固定的收入回報。若要簡單劃分，正式經濟能讓工作者賺取固定工資(Wage-earning)，而非正式經濟則是屬於自作業(Self-employment)的一種。如上章節所述，大部份拾荒者所得的工作機會並不穩定，而且他們所付出的勞動力往往得不到應有的收入回報，因此拾荒業一直被歸類為非正式經濟活動，從事拾荒工作的大多是社會老弱傷殘、沒法進入正式經濟市場的一群。

在香港這個以資本主義作主導的社會中，資本家(社會中最富裕的一群)掌握着生產的技術，他們需要購買生產的勞動力(工人)，有了生產的技術和勞動力，就能賺取更多的資本。可是，當工人的產能不足，資方只好將多餘的勞動力給排除，而拾荒者正是資本家所開除的多餘勞動力，他們或許是沒法滿足正式經濟體系所要求的生產力而被剔除。(劉大加 2007) 另外，或許有人會問：為何我們不可對待拾荒者如對待清道夫一樣？因為他們的工作動機大致相同，都是為了清理街道旁的垃圾。

正職為清道夫，下班才會拾荒的好姐曾說，當她做清道夫工作的時候，人們大多會讓路給她，比她當拾荒者時更有禮貌地對待。當拾荒者和清道夫的分別是甚麼？事實上，兩者最大的分別是在於權力的差異，清道夫是政府所聘請的，他們有一套制服需要在工作時穿上，代表了他們是為政府、為自己的地方工作。一方面他們需要遵從政府所制定的法則工作，種種的工作法則代表了被規範的權力，另一方面，他們同時能獲得政府提供的工作保障，能擁有固定的收入和福利。反觀拾荒者，雖然他們同時做着清理垃圾的工作，但是他們卻缺乏政府或是任何機構的工作保障，他們從事的是非正式經濟活動，他們勞動是為了自身利益，而非政府或所居住地方，這樣他們並不可能獲得勞動階級應有的權力和福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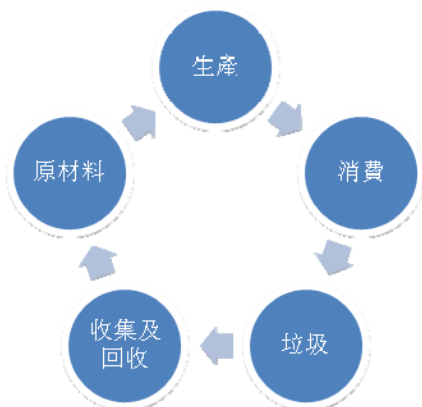
儘管拾荒業是不被社會規範的非正式經濟活動，我們也不可扼殺拾荒業對低層階級的重要性。事實上，拾荒業並非如大眾所想，只是一種回收垃圾、讓老人家維持生計的工作，它更是為社會的低層人士提供了安定、就業的機會。就如我曾訪問過的周先生，他是我所有受訪者中最年輕的一位，早年前他因為手臂受傷了，沒法再從事原來的裝修工作，在沒法找到新工作的情況下，他選擇了以拾荒維生：

「我沒有想過(會做這拾荒行業多久)！現在生活還可以…。現在我也習慣了，好像現在的失業率這麼高，到外面工作還不是會被裁掉。」

周先生的例子其實相當常見，拾荒工作雖然從表面看來是骯髒、底層和負面的，但它卻為社會弱勢的一群，例如失業、殘疾、年老等等的人士，提供了重新工作的機會，同時它大大省去了社會的福利支出，由低層階級引發的社會問題亦可減少，拾荒可說是一種解決潛藏社會衝突的經濟活動。所以在香港，拾荒這種非正式經濟活動還能在政府不干擾的情況下繼續運行。

但有一點必須留意，非正式經濟是一種相當複雜的系統，政府能夠容許社會出現拾荒活動，不只是因為它能安定低層階級，更因它能與正式經濟構成聯繫。(Portes & Castells 1989) 雖然拾荒工作被視為非正式經濟活動，但它卻是一種貫穿商鋪、街道、垃圾站、回收站等正式經濟場所的工作。香港龐大的消費力刺激了經濟生產，原材料是經濟生產的重要物資，社會大量的消費活動產生了垃圾，拾荒者就是依靠拾取這些垃圾維持生計，當垃圾被拾取和回收後，就可重新變成原

材料支持經濟生產，生產又可再催谷消費，形成一個生產與消費的循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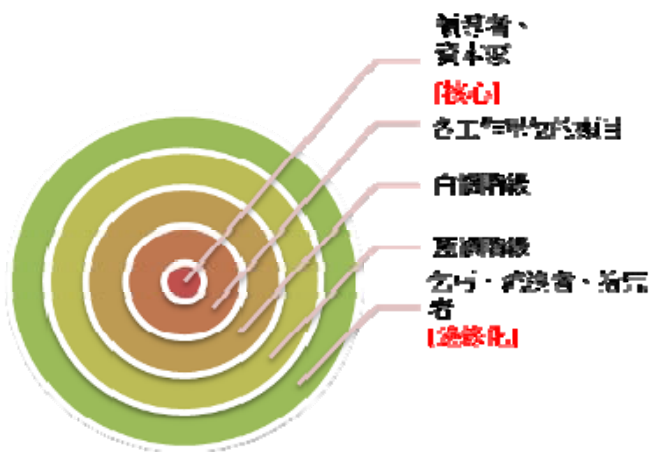


由於現時國際原材料的價格與需求正同步上漲(全球箱包網 2012)，因此促使了回收原材料的需要。而拾荒者可說是市場上的廉價的勞工，他們拾取垃圾進行回收，而他們所能獲得的回收價往往比政府進口原材料的價錢低很多，政府因此能利用拾荒者的勞動力間接獲取更多的原材料。就以上的生產和消費循環圈而言，拾荒者無疑在其中擔當着相當重要的角色。

總括而言，非正式經濟並非完全脫離了政府的管制，而是政府以另一種機制容許他們的存在。對政府而言，非正式經濟體系的存在，是社會不安份子的安定劑、能夠為社會提供新的經濟成長、補償正式經濟市場上的不足 (Portes & Castells 1989)，因此從事非正式經濟活動的，能夠獲得政府的默許繼續以邊緣化的狀態存在於社會空間之中，不用被完全排斥在外。

被邊緣化的拾荒者

階級制度無疑存在於香港，著名的德國哲學家Karl Marx曾說，階級制度的出現主要是以「勞動力」作區分，將社會不同的群體分類，階級與階級之間的差異造就了不同階級的認同感。不同階級會因應各自的勞動力性質，產生不同文化符號，並透過辨別這些符號來建構階級之間的認同感，就好像屬於上流階級的人會以名車代步、出入高級餐廳、談吐間會夾雜英語等，這些全是屬於上流階級的符號，擁有相同文化符號的會被歸納為同一階級之中。生產力會影響着一個階級的



高低位置，擁有較高生產力或是領導力的往往階級地位較高，相反擁有最少甚至無生產力的，只有被安排於階級制度的邊緣位置。(劉大加 2007；曼德爾 2009)

跟據Marx的理論，社會是視乎人們擁有多少生產技術而判定其所屬的階級，因為生產技術的掌握能為社會製造所需產值，從而貢獻社會，每人掌握的生產技術亦有複雜與簡單之分，就好像一位建築師設計出一棟房子，與一名地盤工人築起一棟房子，兩者也利用了一定的技術建造作同一樣產品，但由於他們生產時所需的技術複雜性不同，因此前者會被稱為白領階級(white collar)，後者則是藍領階級(blue collar)。Marx亦說當任何人不再屬於這兩個階級，或是領導階級時，即表示他的生產力已不能為社會提供所需產值，因此會漸漸被社會邊緣化。就像路旁的乞丐，他們不能為社會作生產，也不能繳稅，反要依靠別人施捨社會多餘物才能生存，所以他們只能淪為社會的最低層階級。(見下圖)(劉大加 2007；曼德爾 2009)

拾荒這行業正是依賴社會多餘的產物——垃圾而存在的。好像路邊的小販經由他的技術把食物加工，製成食物提供給逛街的人，這是一種生產技術與需求的關係，因此小販並不會被邊緣化，因為我們需要他們提供的食物。但反觀拾荒是一種靠著回收和轉售社會剩餘物而成的行業，拾荒者沒有製造、或從事服務業的技能，它只是一種消化業，它所消化的是社會製造的垃圾，就如乞丐一樣需要社會的施捨才能維持生活，所以從事拾荒的人在社會階級裡，不只是底層階級，而是被社會邊緣化的一群。(張寒梅 2001)

在階級制度的驅使下，社會的資源被不平等地分配，階級越高的所能獲得的資源越多，最終造就出一群貧窮人士。根據Marx的理論，一個人會否成為窮人是取定於他有沒有為社會提供生產的價值，社會大眾普遍會認為貧窮是造就各種社會問題的主因，窮人在他們眼中是懶惰、不善生產、甚至是需要畏懼的，但事實上，窮人只是缺乏機會，才會被社會邊緣化。(劉大加 2007；曼德爾 2009)

觀看香港的經濟狀況，為了尋找更便宜的勞動力和原材料，與及低限制的生產標準，早在八十年代末，香港的廠商和企業紛紛轉為北上投資，這導致本地公司和工廠倒閉、裁員的情況頻頻發生，最後許多失去工作的人只好選擇另覓工作，沒法轉工的唯有投身底層勞動市場，例如清潔、拾荒等，他們希望利用自己的勞力繼續謀生。他們這種做法不但沒有製造更多社會問題，更是為自己尋覓得另一種安穩生活的方法。(馬傑偉，曾仲堅 2010) 就拾荒業而言，絕大部份從事拾荒工作的人都是為了維持生計，據我訪問所得，基本上絕大部份的拾荒長者的收入，就算加上了政府的資助，也只僅足夠他們糊口。若要他們想要同時進行儲蓄，增大經濟基礎可說是沒甚可能。但是不少拾荒長者告訴我，他們會堅持自己的拾荒工作。儘管當中的原因可能只是為了自身的生活，但他們的堅持至少幫助了社會減低貧窮所衍生的問題。

就如上述所指，對較年青一輩而言，拾荒可被視作為等待就業時期的臨時工作，而對於我所訪問過的拾荒長者，它卻是自己晚年的生存方式，相當重要。不管拾荒的工作骯髒或是正當與否，它只少能幫助安定社會結構中出現的不安定份

子，亦能幫助紓緩社會因貧窮所產出的問題，是對社會有貢獻的一份工作，需要社會大眾尊重。

總結

在日常生活中，社會大眾往往受到外在觀感的影響，而將拾荒群體忽略甚至污名化，這種被社會排斥的情況更常見於年長拾荒者身上。因此，本研究希望以拾荒長者的聲音為出發點，而非純粹以社會大眾的眼光，去了解拾荒群體真實的生活情況，與及其社會地位角色的建構過程。我透過多次的田野考察和深入訪談，發掘和記錄了許多拾荒長者的聲音，從而了解到拾荒長者切身面對的生活困境，更從中促使我深入反思，拾荒長者這群體的生存狀態是如何受到現代化社會的運行模式影響，而他們在社會的存在意義又是甚麼。

在香港，拾荒者幾乎存在於社會的每個角落，可是本地有關拾荒者的研究仍是相當不足，大多現存的研究亦只是集中探討拾荒者的基本生活狀況。有鑑於此，本研究除了更深入地在經濟狀況、工作環境、同行競爭、家庭關係、社會網絡等方面了解香港拾荒者的生活景況外，亦嘗試從社會的經濟、制度與政策、階級結構、空間分佈等方面分析拾荒長者的地位角色，並探討他們在社會有何功能性。

通過分析，我們了解到在現代化的香港社會中，社會制度將欠缺勞動力的一群排除於正式經濟體系之外，社會秩序的形成和政策（特別是環保上）的制定大大限制了拾荒者的工作，當政府推行「亂拋垃圾定額罰款政策」與「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來改善社會衛生情況的同時，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政策所限制的，不只是違反了政策的人，也會波及到從事回收或同類工作，而當中拾荒者所受的影響相當明顯，但他們卻缺乏工會/志願團體為他們發聲。

另外，拾荒者由於缺乏勞動市場所需的產值，因而沒法擁有提升其階級地位的能力，只好從事與垃圾為伍的工作。但我們還是能看到拾荒者的韌力與堅持。拾荒者的勤勞，能使垃圾重拾原有的價值，例如垃圾被回收後能提供生產所需的原料，又或是在天光墟中，可以看見拾荒者所販賣的回收物能轉手成為其他底層階級所需的日常用品。拾荒者所做的，不只是為了自己的生活，而是幫助到社會獲取更多原料，與及惠顧到其他底層階級的需要，可惜社會甚至是拾荒者本身都不曾了解到拾荒工作的重要性，使到歧視與排斥常常發生在拾荒者身上。

最後，本研究希望帶出的訊息是香港的拾荒者並不只是城市的清潔和回收員，更不是傳播細菌和污染環境的社會冗員，相反他們絕對有存在的必需性。事實上，本研究經常重申拾荒是一種自由度極大、低成本(甚或是無需成本)的工作，只要能夠放下世俗的眼光，任何人都可以以拾荒維生。它並非一項正式經濟活動，但卻能為社會長期或暫時沒法投入勞動市場的人口提供緩衝空間、幫助政府降低社會福利支出、減少因貧窮所衍生的問題、安定社會底層的不穩定性。而以上種種的功能並不是正式經濟市場所能提供的。

研究反思

當我在田野考察和摘寫此研究報告的過程中，我經常有一個疑問，那就是為何拾荒者與清道夫的工作性質幾乎一致，但拾荒者就不能被視為另一隊清道夫？在上文我曾提出客觀的因素為此問題作解，清道夫與拾荒者兩者的分別是在於清道夫是政府所聘請的，擁有被認可的權力；但拾荒者卻是從事非正式經濟活動的自雇者，因此地位和所擁有權力跟清道夫不同。當然，清道夫的重要性是不能夠被抹殺的，畢竟有些垃圾是拾荒者不會撿取，例如食物殘餘、樹葉樹枝等，這些全是清道夫替我們進行清理，但同時有許多垃圾是拾荒者會撿取的，因此清道夫與拾荒者兩者經常出現隱性的競爭。

不同於清道夫，拾荒者並不擔心有過多垃圾需要清理，相反他們只擔心垃圾不夠多，因為他們是以累積和回收垃圾維持生計，垃圾越多代表他們能賺取越多。因此，他們會四處在街道上流連，找尋可被回收的拾荒物。不過由於他們工作於衛生環境惡劣的地方，使得他們常常遭受歧視，甚至是政府的衛生管理人員的驅逐。但政府同時亦不會完全抹殺他們的生存空間，因為社會始終需要這群「廉價」的工作群體。其實拾荒所需成本極少，人們隨時也可加入這行業，因此存在於社會中的拾荒者人數遠遠比清道夫多。而我認為社會可以利用這一批額外的「清潔工」維持城市的整潔度，最理想的做法就是將正式處理垃圾的部門與拾荒系統加強聯繫，例如加強對回收場所的監管、增添專為拾荒者而設的福利政策、多派員了解拾荒者的生活和工作狀況等等，只有這樣才可更有效地保持社會衛生狀況，並改善拾荒者的生活景況，滿足社會底層的需要（西吉爾 2005）。

參考文獻

- Giddens, Anthony. 1991.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art, Keith. 1973. "Informal Income Opportunities and Urban Employment in Ghan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1(1): pp. 61–89.
- McBride, Bunny, Dana Walrath, Harald E. L. Prins, and William A. Haviland. 2008.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Human Challenge*. 13th Edition.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 Mingione, Enzo. 1993. "The New Urban Poverty and the Underclass: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 Research*, Vol. 17, pp. 324–326.
- North, Douglass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and Co.
- Portes, Alejandro, and Manuel Castells. 1989. *World Underneath: The Origins, Dynamics and Effects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Sennet, Richard, and Johnathan Cobb. 1993. *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Sharma, Rama. 1995. *Bhangi, Scavenger in Indian Society: Marginality, Identity, and Politicization of the Community*. New Delhi: MD Publications.
- Wong, Hung. 2001. *Concern Streetsleepers 2000: Study of Late Night Streetsleepers*. Hong Kong: St. James' Settlement and Christian Concern for the Homeless.
- 王明青. 2003. 《撫摸香港》。香港：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 方孝鼎. 2005. “排除與整合：底層階級 (underclass) 概念的緣起、流變與本土關連”。發表於「社會暨健康政策的變動與創新趨勢：邁向多元、整合的福利體制」國際學術研討會，頁 93–125。高雄：臺灣社會福利學會年會。
- 西吉爾·卡特琳·特著；劉躍進，魏紅榮譯。2005. 《人類與垃圾的歷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 全球箱包網. 2012. “原材料價格上漲 五金行業門檻抬高”。載中國制造網站 <http://big5.made-in-china.com/info/article-3023984.html>, 2012年3月21日。
- 阮冠穎. 2003. 跨界地下經濟：金門小貿易之社會分析。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瑞琪，葉寶琳. 2010. “應從速取締不義的「衰仔紙」制度”。載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網站 <http://www.hkjp.org/comment.php?id=180>, 2011年11月4日。
- 香港立法會. 2010. “有關「推動廢物循環再造產業」的動議辯論 進度報告”。載香港立法會網站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counmtg/motion/cm1124-m2->

- prpt-c. pdf , 2012年2月17日。
- 香港統計處. 2011. “普查結果—2011香港人口普查”。載香港統計處網站
<http://www.census2011.gov.hk/tc/census-result.html>, 2011年12月22日。
- 香港電台. 2011. 《窮富翁大作戰II》。於3月22日 放映。
- 陳光明. 2011. “漣漪”。載群策學社網站
http://hkstrategy.com/chi/Reports/report1_201104.pdf, 2012年3月29日。
- 陳迪暉. 2004. “從社會與風險資本觀點比較經濟風險下的企業生存之道”。載《運籌研究集刊》第五期, 2004年6月, 頁1-30。
- 馬傑偉, 曾仲堅. 2010. 《影視香港: 身份認同的時代變奏》。香港: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 張寒梅. 2001. 《城市拾荒人: 對一個邊緣群落生存現狀的思考》。貴陽: 貴州人民出版社。
- 曼德爾·厄內斯特著; 向青譯. 2009. 《馬克思主義入門》。香港: 新苗文化, 連結雜誌社。
- 曾繁光. 2007. “垃圾站旁的黃昏”。載《被遺忘了的生命力》, 頁221-227。香港: 花千樹。
- 劉大加. 2007. 都市拾荒者的社會文化變遷—以高雄市為例。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古蹟維護研究所碩士論文。
- 潘正德. 2009. “台灣大學生身心健康研究初探”。載台灣高等教育研究電子報
<https://www.cher.ntnu.edu.tw/epaperi/topics/nindex2.php?no=9>, 2012年3月18日。
- 樓瑋群. 2007. “香港拾荒長者研究報告”。載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網站
http://www.hkcss.org.hk/prar/research_report/waste-collector_researchrpt.pdf, 2011年7月23日。